



編者：劉雲輝
攝影：王保平
邱子渝

北周隋唐 京畿玉器



重慶出版社

BEIZHOU SUITANG JINGJI YUQI

楊建芳師生活古玉研究會古玉圖錄系列之一



ISBN 7-5366-4302-0



9 787536 643024 >

ISBN-7-5366-4302-0/J.584

定價：新台幣(精)2000元(平)1800元

450

北周隋唐 京畿玉器

編者：劉雲輝
攝影：王保平
邱子渝

BEIZHOU SUITANG JINGJI YUQI

重慶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北周隋唐京畿玉器 / 劉雲輝著. — 重慶: 重慶出版社,
2000.6
ISBN 7-5366-4302-0/J · 584

I. 北... II. 劉... III. 古玉器 - 長安 (歷史地名)
- 圖集 IV. K876.8-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0) 第 31864 號

北周隋唐京畿玉器

—— 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古玉圖錄系列之一

編著: 劉雲輝

攝影: 王保平 邱子渝

拓本: 張 俊

綫圖繪製: 孫安娜

責任編輯: 鄒 禾

裝幀設計: 向海濤 鄒禾 秦雪

出版發行: 重慶出版社

(重慶市長江二路 205 號)

臺港海外總經銷: 臺灣漢牛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一四七巷十七弄七之二號一樓)

製版印刷: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0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 889 × 1194 1/16 印張: 12

書號: ISBN 7-5366-4302-0/J · 584

定價: 新台幣(精)2000元(平)1800元



編者簡介

劉雲輝，1954年5月出生於陝西省扶風縣，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曾任陝西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副館長、西安半坡博物館館長。現任陝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副研究員。曾赴瑞典、希臘、印度、埃及、美國、英國及臺灣等地進行業務考察和學術交流，出版兩部專著：《秦始皇陵之謎》和《周原玉器》。在國內外刊物發表各類學術論文40餘篇。

FH4

揚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古玉圖錄系列之一

北周隋唐京畿玉器

編輯委員會編委：

陳啓賢	PHILIP CHIEN
杜勁甫	STEPHANE DU
汪俊呈	WANG JUN CHEN
江榮宗	Y.C. CHIANG
李必楚	LI BI CHU
廖泐修	PHILIP LIAO
王家修	WONG CHIA HSIU
王照宏	WONG JAO HONG
林正豐	LIN CHIENG FONG
林宗漢	LIN CHUNG HAN
張月華	CHANG YUEH HUA
黃碧鈺	HUANG BEE YU
鄭錫欽	JEN HSI-CHIN
蔡勝雄	TSAI SHENG HSIUNG
蔡雅珍	TASAI YA CHEN
蔡昌里	CHANG-LI TSAI

序

一九九五年秋我應邀赴臺灣講授中國古玉，為期一周，事後反映不俗。主事者建議將講學定為常設課程，以便更多的古玉愛好者有機會聽講。因而由翌年元月份起，大致每月在臺北上課一次，教學內容兼顧全面性及系統性，並依據進度逐步深化。初設基礎課，繼有專題課（“二十五種古玉的起源和演變”），其後更加開研究班課程。迨至一九九八年春，因香港課務繁忙，難以分身，不得已結束這一遠地教學。計在臺設帳為時兩年多，受業諸君除課堂認真學習、追求知識之外，還不時聚會切磋琢磨，交流心得，久之遂有師生古玉研究會的組織。

師生古玉研究會的宗旨，首要是促進會員對古玉知識之學習，為此，曾開展對坊間古玉著作之討論，舉行專題演講，觀摩公私收藏，以及組織會員前赴大陸考察考古發掘現場和參觀出土古玉。其次是推廣古玉研究，具體工作有兩項：一項是順應科技發展，利用電腦建立古玉資料庫。除輸入有關文字資料（發掘報告和論著）之外，尚儲存出土玉器圖象，便於會員檢索查閱，從事研究和寫作。這是目前正在進行的、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另一項是出版具有較高水準的圖籍和論著（作者不限於會員），作為師生古玉研究會叢書，以期對古玉學界有所貢獻。叢書的第一種便是本書——《北周隋唐京畿玉器》。我想在這裏順便談談這本書的幾個特點。

如所周知，起源古遠的中國玉雕發展至魏晉——隋唐時期，由於時移事易，出現了顯著的變化。一方面傳統的器類雖然繼續存在，但形制和紋飾都衍生出一些新的特點；另一方面，隨着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中亞和西亞藝術乃至佛教藝術的影響，在中國玉雕上也得到反映。可以說，魏晉——隋唐時期，是中國玉雕史上多姿多彩的一頁。

西安地區為北周隋唐京畿所在，是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自然也成為其時玉器製作和流行的主要地區。《北周隋唐京畿玉器》囊括了近五十年西安地區出土的北周隋唐玉器精品，琳琅滿目，集中反映出這一時期玉雕的高度水準，是賞析和研究北周隋唐玉雕不可或缺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除了資料珍貴之外，這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充分利用特寫鏡頭，突現細部，或以綫繪、拓本配合彩圖，務使讀者能獲得明晰和深入的了解。與坊間有關圖錄比較，高下立判。第三個特點是，書中提到一些新穎獨到的見解，而非人云亦云，由此可見著者的深厚功力。

限於篇幅，未能逐一一列舉本書的優點，讀者不難從中發現。

本書著者劉雲輝先生長期在陝西文物系統工作。其大作《周原玉器》早已蜚聲古玉學界。《北周隋唐京畿玉器》為其新近力作。對於雲輝先生在古玉研究方面的豐碩成果，謹在此表示敬意和衷心的祝賀。

楊建芳

二〇〇〇五月十五日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自序

陝西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這裡自古以來就有悠久綿延的玉作傳統，6000年前仰韶文化半坡遺址及南鄭龍崗寺遺址就有不少玉器出土，陝西龍山晚期至夏代遺址中如神木石峁、佳縣大葆當、延安蘆山峁等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西安老牛坡的商代遺址墓葬中也有玉器出土。周原和寶雞強國墓及豐鎬兩京遺址墓葬中出土的西周玉器數以千計。春秋時期的秦國玉器獨具特色。漢代玉器更是聞名遐邇，皇后之璽，茂陵四神玉鋪首舉世無雙，渭陵出土的玉仙人奔馬、玉熊、玉鷹、玉辟邪形神兼備，氣派宏大，世所罕見。兩漢以降，魏晉南北朝時期，玉器處在相對停滯期（或可稱之緩慢發展期）。隋唐時期，戰亂結束。隨着絲綢之路的重新開通，新疆和闐美玉源源不斷輸入長安，更由於當時國門大開，中國玉器首次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故在隋唐京畿之地發現了諸多呈現中西文化結合特徵的玉器。如羚羊首瑪瑙杯，白玉忍冬紋八曲長杯，水晶八曲長杯等。此一時中國玉器由上古風格向中古風格迅速轉變，迎來了以實用玉器為中心，以人體裝飾為主流的新時代。

本書收集了陝西近半個世紀以來出土的北周至隋唐時期的玉器百餘件組，從中可以看出隋代的玉器繼承了北周傳統，唐代的玉器又直接繼承了隋代的傳統並將其發揚光大。盡管目前發現的唐代玉器相對較少，但從歷史文獻記載證實玉器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卻高於金銀器。以目前唐代京畿之地發現的玉器而論，種類龐雜，造型氣韻生動，紋飾精美流暢，風格寫實，雄渾豪放者有之，精緻細膩者亦有之，金玉結合者比比皆是，足以反映盛唐氣象和唐人追求豪華熱烈的審美價值取向，其玉器在中國古代玉雕史上仍占有不容忽視的地位。作者對其進行了初步研究，以期引起更多的學人予以深入的研究。

是為序。

2000年4月於古都西安

北周京畿玉器

劉雲輝

北周是中國歷史上由鮮卑人建立的某種程度的漢化政權。它建都長安(西漢長安城故址),從公元557年建立至公元581年為隋所取代,歷孝、明、武、宣、靜五帝,共二十五年。北周王朝雖然國運短祚,但由於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府兵制、均田制、田租、戶調力役制等,尤其在周武帝時,北周迅速崛起,由弱變強,終於打敗了北齊,統一了中國北方,為隋代最終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戰爭頻繁,玄學流行,佛教興盛,流行薄葬,玉器的神秘色彩逐漸消失,玉器需求明顯減少。因此,此期玉器總體面貌處於衰落和停滯期,但亦不排除在某些地區仍有一定緩慢的發展。按照歷史文獻記載,北周帝王亦主張薄葬,“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金玉之飾”(《周書·明帝紀》、《周書·武帝紀》)。《周書》關於輿服制度的文字中亦罕見用玉的記載。近十幾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北周京畿之地先後發掘了北周武帝孝陵,北周重臣章孝寬和北周驃騎大將軍若干雲的墓葬,出土了部分玉器,另外在西安市南郊小寨也出土了北周時的玉器,在西安市北郊出土了三尊漢白玉菩薩造像。這些都為人們認識北周的玉器特徵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現將這些玉器出土情況及其特徵概述如下:

1. 1993年在陝西省咸陽北原底張灣的陳馬村發掘了北周武帝的孝陵^①,該墓雖然被盜掘,但仍出土了“周武帝孝陵誌”、“武德皇后墓誌”、純金獨角獸紐的

“天元皇太后璽”、鑲金銅帶具和一批彩繪陶俑,在周武帝骨架下出土了一塊直徑31、厚1.2厘米的素面漢白石璧,在墓道五號天井的西龕內,出土了兩件長3.8、寬1.8、厚0.17厘米的雲頭形珮(珩)和兩件長2.3、厚0.17厘米的璜,其質地均為漢白石,另外,在墓室還出土了四件形體很小的玉珠,這些璧、珩、璜等均是明器無疑。這也符合周武帝生前的遺詔:後事從儉,勿使金玉之飾。周武帝身背所置的大型漢白石璧是用來斂尸的,說明北周時“璧可助生民溝通神祇祖先的信念”^②在鮮卑人建立的政權中仍然存在。

2. 1989年在陝西省長安縣章曲發掘的北周權臣章孝寬的墓葬,出土了一件青玉穀紋璧^③,章孝寬一生為北周屢建功勳,尤其在滅北齊的戰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死後隨葬的玉器僅是一件漢代的遺物。

3.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為了修建陝西西安咸陽機場,對其所徵用的土地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了一大批北周皇戚貴胄文武大臣的墓葬^④,大部分墓葬中都沒有發現玉器。但在1988年5月發掘的七號墓葬中卻發現了一條玉帶,該墓為三天井三甬道斜坡式土洞墓,人頭骨頂上插兩枚金簪,右側置銀碗、銅鏡各一,腰間繫一條完整的玉帶。根據出土的墓誌可知,墓主人為北周武帝時的重臣、任城郡公驃騎大將軍若干雲,史書對其人無載,墓誌記載了若干雲一生追隨周武帝屢建奇功,周武帝將女兒與其作配。若干雲死於北周宣政元年(公元578年),若干雲腰間所繫的玉帶由八枚附玉

環的方鈐和一枚鉞尾、一枚玉帶扣及扣柄、九枚偏心孔玉環及兩枚蹀躞帶飾所組成(圖版B1-7)。按照北宋沈括《夢溪筆談》所言:“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以佩帶弓劍、帔帨(拭物的佩巾)、算囊(裝算籌之類的小袋子)、刀礪(磨刀石),自後雖去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躞,如馬之鞅根,即今之帶鈐也,天子必將十三環為節,唐武德貞觀時猶爾……”但從考古發現的實物看,東漢時期就出現了蹀躞帶,在河北定縣43號東漢墓中出土了附環的銀質長方形帶鈐,所附之環呈馬蹄形,環孔鑲成凸字形^⑤,附環的目的就是為了懸物,所懸之物就是蹀躞帶飾。到了晉代,蹀躞帶已經流行,但當時帶是金屬製作的。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的玉鈐帶扣是在河南洛陽東關夾馬營東漢墓中出土的^⑥。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透雕龍紋玉帶具“其龍紋;祇有一角三足,且其口形邊框上下不對稱,似將殘器加工修琢而成……此物亦當是晉式帶具中帶扣對面的牌飾”^⑦、從背後的銘文考證,此物原為南朝宋文帝(在位公元424年—公元452年)革帶一端的牌飾,由下臣所奉進的。^⑧此物亦可視為最早的玉帶的祖型之一。而完整的玉帶最早的記錄見於《周書·李遷哲傳》,其中有“太祖以其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賜之”的記載,其帶屬蹀躞玉帶。北周使用蹀躞帶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如《周書·李賢傳》所載:“高祖……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禦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前述在周武帝

孝陵中發現的鍍金銅帶具一套，由帶扣、條狀帶、活頁式帶銙、蹀躞帶飾、獸面紋圓形帶銙、偏心孔環（扣眼）、鉞尾等31件所組成。其圓形帶銙13枚，偏心孔環13枚，雖然屬於明器，但它的形制仍是按帝王等級去製作的，也和文獻記載的數目相同。若干雲的墓所出玉帶為九方銙（加扣柄鉞尾）共11銙，附八環、偏心孔環亦是九，它與若干雲的身份等級是相符的。若干雲墓出土的玉蹀躞帶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時代最早，結構最完整，保存完好，拋光工藝相當精湛的玉帶。在隋大業四年的姬威墓所出玉帶具和唐代所出土的玉帶具中除了部分玉帶雕琢紋飾之外，其基本形制和結構均與若干雲墓出土的玉帶相同，說明了玉帶在北周時已經趨於成熟，又證實了隋唐文化許多因素是對北周文化的直接繼承和發展。

本世紀七十年代，在西安市南郊小寨的基建工地，發現了兩枚北周時期的蝙蝠形珎，一件梯形珎，其形體均較大，光素無紋^③（圖版B8-10）。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寺院林立，但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却發動了一場滅佛禁道運動，北方的寺院被廢，佛像被毀，勒令僧道還俗，包括北周京城的諸多寺院也在被廢之列。1994年，在西安市北郊漢城鄉西寨村（北周京城）的一寺院遺址中發現了三尊漢白玉雕刻的貼金彩繪菩薩造像（B10-12），當屬周武帝滅佛劫後餘生^④，三尊菩薩均站在仰蓮座上，通體又置於雕有護法蹲獅的青石覆盆蓮花座上，菩薩面容和藹可親，姿態優美動人，

身飾瓔珞，手提淨瓶，由於選用上等漢白玉，拋磨光亮，質感晶瑩，雕琢精緻，加之彩繪貼金，更顯雍容華貴，充分展示了佛教徒對佛的虔誠和對菩薩的崇敬。

綜上所述，北周京畿所發現的玉器數量不多，許多高級貴族墓中甚至不見任何玉器，周武帝孝陵中的玉珎只是形體很小的漢白石製作，隨身所葬的大璧也是漢白石所製，為滅北齊立下汗馬功勞的章孝寬墓中僅有一塊西漢時的舊玉璧，反映了此期玉器衰落，玉禮器徒具形式而已。北周時的玉珎，多為蝙蝠形，玉珎多為梯形，玉璜僅作裝飾品，所有玉器均不雕紋飾，光潔樸素。從若干雲墓出土的玉帶反映了此期玉帶形制已趨成熟，證實《周書》中所記周太祖服玉帶無誤。玉帶選材十分考究，選用新疆和闐上等美玉，製作工藝頗為嫺熟，其中一方銙鏤空成柿蒂紋形，背襯金板，金玉輝映，富麗堂皇。玉帶具拋光打磨工藝更為精湛，帶銙、銙尾光潔如鏡，皆可照出人影。若干雲墓玉帶形制和工藝均為隋唐所繼承。北周京城寺院遺址出土的三尊菩薩造像，質地雖非真玉，但晶瑩似玉，是此期佛教造像中的精品。

總之，北周京畿玉器雖處在玉器發展的衰落時期，但若干雲墓發現的玉帶卻令人刮目相看，它不但對研究北周的輿服制度極具價值，而且對研究隋唐輿服制度，尤其是玉帶形制和治玉工藝的淵源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注釋：

①張建林：《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

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2期，246頁。

②鄧淑萍：《由考古實例論中國崇玉文化的形成與演變》，載《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814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四，1997年7月。

③承蒙戴應新先生提供。

④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⑤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43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11期

⑥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東關夾馬營路東漢墓》，《中原文物》1984年3期。

⑦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215頁，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⑧殷志強：《古玉鑒定通論》，197頁，曄瑾出版社，1997年4月。

⑨王長啓等《玉器》，71頁，陝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⑩《女皇武則天時代展》，32-33頁，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1998年。

隋京畿玉器

劉雲輝

公元581年，北周丞相楊堅廢周靜帝自立，建立隋朝，改元開皇，第二年便在漢長安城的東南龍首原上創建新都，號大興城，又於開皇七年滅後梁，開皇九年滅後陳，統一了全國，結束了自三國魏晉南北朝三百餘年的分裂割據狀態。楊堅死後，其子楊廣繼位，稱隋煬帝，於公元618年被李淵、李世民父子所推翻，隋王朝經楊堅、楊廣兩代歷時37年被唐王朝所取代。

隋代的統一，為玉器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絲綢之路的重新開通，為隋王朝使用新疆和闐美玉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隋文帝楊堅執政時期，輿服制度多沿北周舊制，在仁壽元年（公元601年）改太子冕冠白珠為青珠。隋煬帝繼位後令服飾借南朝梁陳之制，上自帝王，下逮胥皂，服飾制度各有等差。據《隋書·禮儀志》所載：皇帝衮冕垂白珠十二旒，用玉二百一十六顆，玉笄、革帶用玉鈎鐙、白玉雙珮，小雙綬間施三玉環；皇太后、皇后白玉珮；皇太子衮冕垂青珠九旒，玉劍具，瑜玉雙珮，小雙綬間施二玉環。皇太子侍從田狩時玉冠枝、玉梁帶。諸王常禮佩玉具劍，瑜玉雙珮，小綬間施二玉環，侯、伯、子、男，皆垂青玉珠，文官助祭亦垂青玉珠。皇太子妃瑜玉珮。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侯、伯夫人助祭朝會諸大事佩山玄玉，子男夫人、嬪從三品以上官命婦、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從五品以上官命婦均亦佩山玄玉。總之，君臣佩玉，尊卑有度，各有等差。雖然隋代帝王陵墓尚未發掘，隋代皇帝所用玉器未曾發現。但近幾十年來，考古工作者

在隋京畿地區發掘了一批貴族墓葬，出土了若干隋代玉器，從而有助於人們對隋代玉器的基本情況能夠有所認識與了解。

現將隋京畿之地貴族墓葬出土的玉器情況按照時代早晚概述如下：

（1）在陝西咸陽原底張灣發掘的隋上大將軍廣昌公王士良的墓葬（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和其妻董榮暉的墓葬（北周保定五年，公元570年），這對夫妻合葬墓^①共出土各類玉器11件組，其中璜形珮兩件、弧邊梯形珮和半圓形珮各一、弧邊梯形珮和雲頭梯形珮各一、玉璧、玉劍首、金帽瑪瑙珠各一，還有水晶串珠146顆和瑪瑙串珠47顆（圖版S1-12）。所有玉器均光素無紋，其玉器大致可復原為兩件玉組珮。

（2）在西安市東郊發掘的隋興寧坊清禪寺寺院主持德口口的墓葬（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②，出土了玉琮、玉豬、彩色琉璃珠、瑪瑙棋子，琉璃棋子、印章、水晶飾等（圖版S12-18），其中玉琮為商周甚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玉豬為東漢時期的遺物。

（3）在陝西長安縣章曲鎮發掘的韋氏家族韋壽墓（隋開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出土了五件玉器，其中三件為扁平體的蝙蝠形珮，兩件為扁平體璜形珮，玉質均為白玉，拋磨光潔。^③

（4）在陝西咸陽原底張灣發掘的北周秦州刺史尉遲運（北周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和其妻賀拔氏墓（隋開皇十九年，公元599年）中，^④出土了青白玉釵四件，玉釵製作規整，玉質細膩堅硬，拋磨光

潔（圖版S19）。

（5）1957年，在西安市玉祥門外梁家莊發掘了李靜訓墓（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⑤，李靜訓雖然是一年僅九歲的小女孩，由於她出身皇親貴戚^⑥，所以葬具豪華精美，隨葬品異常豐富而精緻，如鑲寶珠的金項鏈、鑲寶珠的金手鐲、金指環、金高足杯和玉石器等。玉石器有：玉指環一對、玉扣、玉刀各一、玉釵和水晶釵各三、玉獸珮和水晶珠各一、獸形白玉飾三、白玉珠六、瑪瑙珠14顆。其中鑲寶珠的金項鏈、金手鐲（圖版S20-21）極具西亞波斯風格，很可能是舶來品，而金扣白玉碗，金玉輝映，玉釵、玉指環、玉獸形珮、玉刀等（圖版S22-25）雖然均光素無紋，但所有玉材均為新疆和闐上等美玉，製作精美，工藝精湛。

（6）在西安市東郊郭家灘發掘的隋龍泉、敦煌二郡太守姬威墓^⑦（隋大業六年，公元610年），該墓共出土玉器22件，皆為青白色，其中雲紋脊梯形珮兩件，其餘均為玉帶具構件，如附馬蹄形孔環的方形銙六、尖拱帶孔銙和鏤空柿蒂紋銙各一、偏心孔環（扣眼）二、玉帶扣（扣環和扣針各一）一件，還有馬蹄形孔環一件（方銙已殘失），這些玉珮和玉帶具均光素無紋。

（7）在陝西長安縣章曲發掘的韋氏家族韋津夫婦墓（隋大業六年）中，出土了一件雲紋脊的四邊形珮，玉為青白色，光素無紋。^⑧

（8）在西安市東郊郭家灘發掘的隋豫章郡西曹掾田德元墓（隋大業七年，公元611年），出土玉器中除了一殘雙股簪

(應稱為釵)之外,其餘的玉器均為玉組珮的構件,計有蝙蝠形珮二、璜形珮二、璜形帶齒珮二、雲紋脊梯形珮一,料珠若干件,其中較大的蟻珠即玉墜兩件^⑧,雖然原來的絲綬已朽,但構件基本完整,因此,完全可將其復原成完整的玉組珮。

上述在隋京畿之地附近發現的玉器雖然數量并不太多,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從中可以看出隋代蝙蝠形珮、璜形珮均與北周時期相同,璧形珮和半圓形珮則是新出現的器形。隋代的玉組珮不僅僅是裝飾品,而是與禮制即等級尊卑相聯系的玉器,如前已述,隋代的玉組珮中白玉珮等級最高,其次是瑜玉珮,再次是山玄玉珮。目前在隋墓中發現的玉組珮除王士良墓中的玉珮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所佩之外,其餘如章壽墓、姬威墓、章津夫婦墓和田德元墓中發現的玉珮,多數製作較為粗糙,玉質亦欠佳,因此,當為隨葬的明器。姬威墓出土的玉帶具與北周若干雲墓中的玉帶具中的附環方鈐、鏤空柿蒂紋方鈐、玉帶扣等幾乎完全相同。由此可以清楚地顯示隋文化是對北周文化的直接繼承。隋代新出現的玉器有玉釵、水晶釵頭,以及玉指環、形似兔子的玉獸珮也不見於南北朝的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是李靜訓墓中出土的帶有假圈足的金扣白玉杯,金玉輝映,富麗堂皇。最引人注目的是鑲寶石的金項鍊和金手鐲,它們均具有波斯風格,而金項鍊上的青金石則為阿富汗所產。

上述隋京畿之地出土的玉器除隨葬品中的明器外,其餘多數均為新疆和闐玉,尤其是李靜訓墓出土的玉器全為新

疆和闐上等美玉,這和歷史文獻記載也是一致的,隋王朝對新疆和闐美玉十分渴求。《隋書·突厥傳》曾記載,遠在漠北的都藍可汗曾遣其母弟褥但特勤向隋文帝獻于闐玉杖。透過李靜訓墓中出土的玉器對隋王室玉器的特征亦能窺知其概略。

隋京畿出土的玉器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1. 皇室玉器選材精美,大量使用新疆和闐上等美玉。
2. 所有玉器均光素無紋,玉帶鈐中偶見柿蒂紋孔。
3. 傳統禮玉幾乎不見,禮儀用玉有玉組珮和玉帶。
4. 仍然使用前代遺物,說明美玉難求。
5. 直接繼承北周文化,又廣泛吸收異域文化成果。
6. 實用玉器增多,如金扣白玉杯、玉刀、玉釵等,為唐代玉器以實用性為中心,以裝飾用玉為主流,表現現實生活氣息濃厚為特徵的新時代來臨,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注釋:

- ① 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119-122頁,圖版二六三-二七四;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年。
- ② 鄭洪春:《西安東郊隋舍利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年1期。
- ③ ⑦ 章壽墓和章津夫婦墓均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戴應新先生發掘,承蒙戴先生見告,玉器陳列在該所標本室。
- ④ 見《中國北周珍貴文物》,第100頁,圖

版二三一。

⑤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16-2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⑥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8期。

⑧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郭家灘隋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8期。

唐京畿玉器

劉雲輝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鼎盛時期，特別是初唐和盛唐，經濟和文化高度繁榮，疆域遼闊，民族融合，絲綢之路的重新開通，使中外文化交流廣泛而深入，曾出現“萬邦來朝，絕域入貢”的盛況，特別是對外來文化，當政者充滿了自信，採取“拿來主義”，為己所用的國策，更是史無前例。而最具中國文化特質的玉器也首次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和衝擊，唐王朝使用的玉除了主要的是來自新疆和闐之外，還有不少域外的貢玉，不僅有玉材，而且還有域外製作的玉器。另外，唐朝的玉工還精心模仿域外玉器的造型，而琢以中國人喜聞樂見的紋樣，使玉器具有中外文化結合的特徵。以美觀實用為主要目的域外文化養料的吸收，加速了中國玉器由上古風格向中古風格的轉變，擺脫了上古玉器以禮為中心，以喪葬用玉為主流的傳統，開創了以實用玉器為中心，以美觀為主要目的的人體裝飾用玉為主流的新時代，為唐代以後玉器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迄今為止，在陝西、河南、山西、寧夏、內蒙古、北京、遼寧、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十七省市均出土了唐代玉器，但出土數量最多，而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主要集中在陝西關中地區。眾所周知，唐代建都長安，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化都市。陝西關中地區為唐京畿之地，唐朝的都城，帝王陵寢、皇親貴族和文武百官的墓地，唐代帝王的離宮別館、唐代皇家寺院均在這裡。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唐京畿之地出土的唐代玉器，數量頗豐，種類齊全，玉質優良，造型生

動精美，紋飾流暢自然，工藝精湛，內涵豐富，有諸多器物屬獨一無二的珍品，可視為目前所見的唐代玉器的最高水準。本文從以下四個方面為題即：一、唐京畿出土玉器資料綜述；二、玉器種類用途及內涵考辯；三、玉材及玉器來源；四、琢玉工藝特徵及藝術成就，對唐代京畿玉器加以探討，從而透視唐代玉器的面貌，概括其基本特徵。錯誤之處，敬請指正。

一、唐京畿出土的玉器資料綜述

本文將唐京畿出土的玉器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階段分別敘述：

(一) 初唐，從高祖武德元年至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18—683年），凡六十六年，此期的玉器多數出自尚有明確紀年的墓葬中。

1. 陝西長安縣南裏王村的唐上柱國左衛府中郎將賈曠墓（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中出土了一副完整的“玉梁金篋寶鈿真珠裝蹀躞帶”和一枚水晶豬形墜（圖版T1—11）。^[1]

2. 陝西三原縣焦村陪葬獻陵的唐司空淮安王李壽墓（貞觀四年，公元640年）中出土了玉珠若干顆。^[2]

3. 陝西禮泉縣陪葬昭陵的唐司徒鄂國公尉遲敬德墓（顯慶三年，公元658年）中出土玉（？）環三件、玉（？）珮兩件。^[3]

4. 陝西禮泉縣陪葬昭陵的唐新城公主墓（龍朔三年，公元663年）中出土玉珮兩件、鷄心水晶飾和小墜玉各一件。^[4]

5. 陝西禮泉縣陪葬昭陵的三品亡尼墓（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中出土兩枚白玉珠和一件白玉鈎（圖版T12）。^[5]

6. 西安市羊頭鎮唐銀青光祿大夫李爽墓（總章三年，公元668年）中出土一件玉牌。^[6]

7. 陝西禮泉縣陪葬昭陵的唐趙王李福墓（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中出土一件玉匙（圖版T15）。^[7]

8. 陝西富平縣陪葬獻陵的唐房陵大長公主墓（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中出土玉盒一件、玉珠一枚。^[8]

另外，尚有王座雖無明確紀年，但從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可判斷為初唐時期的墓葬也有玉器出土，它們是：

9. 陝西禮泉縣陪葬昭陵的02號墓中出土竹節形玉握一件（圖版T14）。^[9]

10. 西安市東郊白鹿原43號墓中出土水晶珠一枚。^[10]

11. 西安市西郊第三印染廠的唐墓中發現玉質口琚一枚。^[11]

(二) 盛唐，從武則天嗣聖元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684—755年），凡七十二年，目前發現的此期的玉器數量最多，種類繁復，工藝精湛，最具代表性，其玉器分別出自墓葬、遺址、窖藏、寺院地宮之中。

出自盛唐墓葬的亦分為有明確紀年和無明確紀年兩類，有明確紀年墓葬所出的玉器是：

1. 陝西臨潼縣地窖村的唐遂州司馬董務忠夫婦合葬墓，董死於天壽二年（公元691年），其妻死於聖歷元年（公元698年），該墓共出土玉珠38枚。^[12]

2. 西安市東郊洪慶村的唐朝議大夫行乾陵令上護軍公士孤獨思貞墓（聖歷元年，公元698年）中出土螭形珪三件、璜形珮兩件、梯形珮和雲紋脊梯形珮各

一、不規則半圓形珮一、蠟珠二、料珠330件^[13]〔插圖A〕。

3. 西安市東郊華山機械廠內的唐嚴州刺史華文弘夫婦合葬墓(神龍元年,公元705年)中出土了竹節形玉握和滑石豬各一件(圖版T16-17)。^[14]

4. 陝西乾縣陪葬乾陵的唐懿德太子李重潤墓(神龍元年,公元705年)中出土玉(?)哀册11枚。^[15]

5. 陝西乾縣陪葬乾陵的永泰公主李仙惠和其丈夫武延基合葬墓(神龍二年,公元706年)中共出土玉器十餘件,其中穀紋璜、鏤空出廓殘璧和走獸游魚珩各一,蝠形珩和璜形珮及偏心孔環各二,玉框一(圖版T25-32)。另外,還出上有殘玉鐲若干段。^[16]

6. 陝西富平縣陪葬定陵的唐節愍太子李重俊墓(景元元年,公元710年)中出土了若干玉(?)謚册和玉(?)哀册殘片,經修復基本完整者有11枚。^[17]

7. 陝西禮泉縣陪葬昭陵的唐越王李貞墓(開元五年,公元717年)出土一組可復原的組珮(圖版T33)和一件玉劍首。^[18]

8. 陝西蒲城縣陪葬橋陵的唐惠莊太子李瑋墓(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出土殘玉(?)册25枚。^[19]

9. 西安市東郊國棉五廠唐韋氏家族韋美英墓(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中出土有玉笄、玉(?)兔鎮、玉(?)豬、玉海螺各一件(圖版T34-T36)。^[20]

10. 西安市南郊等駕坡的唐驃騎大將軍號國公楊思勳墓(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中出土了漢白石武士雕像(圖版T39)和漢白石文官雕像各一件。^[21]

出自無明確紀年的盛唐時期墓葬的玉器有:

11. 西安市西郊203號唐墓出土玉釵兩件。^[22]

12. 西安市西郊電纜廠的唐墓出土兩件玉釵(圖版T56)。^[23]

13. 西安市西郊第三印染廠唐墓出土滑石豬和漢白玉獅形香熏各一件(圖版T20-24)。^[24]

14. 陝西長安縣章曲唐墓出土滑石豬一件(圖版T17-19)。^[25]

15. 陝西長安縣章曲36號唐墓出土白玉(?)女雕像一件(圖版T38)。^[26]

16. 陝西鳳翔縣城南28號唐墓出土斑玉盒一個(圖版T60)、水晶飾兩枚。^[27]

17. 西安市西郊熱電廠的唐墓中出土玉釵和方形玉飾各一件、水晶珠八枚、綠松石五件。^[28]

18. 西安市東郊白鹿原唐墓中出土玉(?)豬和玉蠶各一件。^[29]

19. 西安市東郊堡子村唐墓,東郊韓森寨唐墓中分別出土了碾文玉帶銙若干件(圖版T105-108)。^[30]

20. 西安市南郊的唐墓中出土了一枚碾琢飛鴻紋的玉梳背(圖版T184)。^[31]

21. 陝西禮泉縣昭陵陵園內出土了一枚白玉碾琢胡人舞蹈紋鈿尾(圖版T61-62)。^[32]

從唐長安城遺址內出土的玉石器分別是:

1. 唐大明宮含元殿遺址東側出土六件大型漢白石圭璧(插圖B)。^[33]

2. 唐長安城南郊圓丘(天壇)附近出土了用於燎祭的玉(?)器殘塊。^[34]

3. 唐大明宮孫家灣遺址出土的一件

白玉嵌金珮(圖版T40-41)。^[35]

4. 唐大明宮遺址內出土了一件青玉鷹(圖版T42-45)。^[36]

5. 唐曲江池遺址出土了一件大型青玉龍頭(圖版T46-49)。^[37]

6. 唐長安城宮城遺址內出土了一件碾琢鴛鴦花卉紋玉盒(圖版T57-59)。^[38]

7. 唐興慶宮遺址卧龍巷出土兔紐龍紋鳳紋葡萄紋玉(?)鎮一件(圖版T37)。^[39]

8. 唐興慶宮遺址西安交通大學校院內出土碾琢海棠、石榴、鴛鴦、鳳紋玉簪花六件(圖版T50-55)。^[40]

從唐長安城郊窖藏出土的玉器主要有三批:

1. 西安市西南郊丈八溝的唐代窖藏中,一次出土白玉碾文帶銙和鈿尾共39件,它們分屬三副玉帶(圖版T63-79)。^[41]

2. 西安市西郊關廟小學的唐代窖藏中,出土了15件碾琢伎樂飲酒紋的白玉、青玉帶銙和白玉、青玉素面帶銙及鈿尾,從形制、鑽孔等特徵分析,它們分屬五副玉帶(圖版T80-108)。^[42]

3. 1970年10月在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發現兩陶甕及一提梁罐唐代窖藏文物,^[43]除了發現270件唐代金銀器皿之外,發現的玉器、寶石等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唐代玉器數量最豐、品位最高的一批,計有玉帶十副,分別是九環蹀躞帶(圖版T111)、碾獅紋白玉帶(圖版T116)、斑玉帶(圖版T135)、白玉有孔帶(圖版T136)、碾伎樂獅紋白玉帶(圖版T138)、更白玉帶(圖版T156)、白玉純方胯帶(圖版T158)、骨咄玉帶(圖版T159)、深斑

玉帶（圖版 T161）、白瑪瑙鉸具（圖版 T163）。容器五件：分別是羚羊首瑪瑙杯（圖版 T164）、白玉碾琢忍冬紋八曲長杯（圖版 T167）、水晶八曲長杯（圖版 T171）、瑪瑙長杯（圖版 T172）、瑪瑙白（圖版 T174）。另外出土的還有玉杵（圖版 T173）、方玉（圖版 T177）、水晶飾（圖版 T178）、藍寶石七枚（圖版 T179）、綠玉髓六枚（圖版 T180）、紫晶兩枚（圖版 T181）、黃晶一塊（圖版 T182）。玉臂環四，分別為鑲鑲金嵌寶石的玉臂環（圖版 T183）、鑲金玉臂環（圖版 T185）。何家村窖藏所在的位置處於唐長安城興化坊中部偏西南，發掘者認為其埋藏當與安史之亂有關，^[44]但也有學者認為此窖藏埋藏時間應在八世紀晚期唐德宗時。^[45]無論如何，該窖藏的文物基本上屬於盛唐時期是可以肯定的。

在陝西臨潼新豐唐慶山寺地宮中出土了金棺銀椁，銀椁蓋上有鑲金團花，團花花蕊為一圓餅狀玉，上飾瑪瑙珠，椁蓋前後均粘有黃藍寶石等（圖版 T188）。^[46]

（三）中唐，從唐玄宗天寶十五載至唐敬宗寶曆二年（公元 756—826 年），凡七十一年。目前唐京畿之地發現的此期玉器較少。

1. 陝西臨潼椿樹村唐惠昭太子李寧墓（元和六年，公元 756 年）中出土了殘玉（？）圭、殘玉（？）璧、玉（？）璜，另外還發現了玉（？）冊文和玉（？）哀冊，冊文為《冊鄧王為皇太子文》共 154 字，哀冊有 127 枚，共 428 字。^[47]

2. 西安市郊區堡子村的唐墓中發現一件碾琢花卉紋的玉帶銙（圖版 T109）。^[47]

（四）晚唐，從唐文宗太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四年（公元 827—907 年），凡八十一年。唐京畿之地出土的此期玉器主要集中在法門寺唐代地宮中，唐僖宗靖陵中則出土了仿玉玻璃器，對研究當時的玉器仍具有參考價值，故本文予以收集。

1. 陝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封閉的時間為唐咸通十五年（公元 874 年）。地宮所出器物多為皇室禮佛供養器。其中玉石器主要有：兩枚玉質佛指舍利（圖版 T197—198），供養佛指舍利的玉棺（圖版 T194）、水晶椀子（圖版 T191）、水晶枕（圖版 T199）、水晶花蕾（圖版 T200）、水晶隋球（圖版 T201）、貳玖石函金篋寶鈿真珠裝（圖版 T202）、純金寶函金篋寶鈿真珠裝（圖版 T205）、漢白玉阿育王塔（圖版 T208）、漢白玉雙檐靈帳（圖版 T209）。^[49]

2. 陝西乾縣陵南村的唐僖宗靖陵（文德元年，公元 888 年）中出土了玉（？）哀冊、玉謚冊，並出土了兩件龍鳳紋琉璃璧（圖版 T210—211）、兩件龍鳳紋琉璃珩（圖版 T212）、龍鳳紋梯形琉璃珮（圖版 T214）、鏤空龍紋琉璃方鈐（圖版 T215）。^[50]

以上資料說明，在唐代的高級貴族墓中纔陪葬玉器，其中有些墓葬還是以石代玉。

二、玉器種類、用途及內涵考辯

唐京畿玉器的種類可分為禮玉、葬玉、裝飾品、容器、用具、宗教器、藝術

品。

（一）禮玉，包括傳統的圭、璧和新出現的圭璧、玉冊、玉帶、玉組珮。

按照歷史文獻記載，唐代似乎還存在着“禮神六器”和“乾坤六器”（《冊府元龜》（卷三三））。但在考古出土物中僅發現極少數的圭和璧。

1. 圭，如前已述，目前僅在唐惠昭太子墓出土一件殘斷的漢白玉圭。根據《新唐書·百官志》（卷四八）記載：“少府，監一人……供天子器饗后妃服飾及郊廟圭玉，百官儀物。”由此說明，唐代的玉圭主要是用於郊廟的祭祀。

2. 璧，目前考古發現的璧共有三件標本，第一件是殘璧，仍是惠昭太子墓中出土，形制為扁平體，中心為一圓孔，復原後邊緣為七邊形，這和傳統的玉璧有所區別。另外兩件璧均出自唐僖宗靖陵，形制雖與傳統玉璧完全相同，但質地卻是琉璃而不是玉。目前所見唐代的真正的玉璧僅有一件傳世品，收藏在上海博物館。^[51]（插圖 C）

3. 圭璧，這是唐代新出現的禮玉，其形制特徵是圭璧連體，上端為一尖首圭，下連一圓形璧，如大明宮含元殿遺址發現的六件圭璧，^[52]形體碩大厚重，材質為漢白石，顏色呈乳黃色灰色斑點，從破裂和顏色等特點觀察當年曾用火燒過，說明它屬於燎祭中使用的禮玉。《禮經》載“圭璧尺有二寸，以璧為邸，而上植以圭，先王以祀日月星辰。”《唐六典·少府監》（卷二二）中所記載的“中尚署令掌供郊祀之圭璧”。都說明了圭璧的用途。

無論是傳統的圭、璧，還是新出現的圭璧，祇要是用於祭祀內容的禮器，往往

都是以石代玉，當時稱為“珉”。說明唐代祭祀用玉已基本流於形式。

4. 玉冊，中國古代一直實行冊命制度，帝王在祭祀天地，冊立王、妃諸大臣時，要將誥文或詔書鐫刻或書於竹簡上，稱為冊文。考古發現最早的玉冊是出自於河南輝縣固圍村一號戰國墓中，出土時，已無文字，當年或許用朱書或漆書，因長期埋在土中已經脫落。^[53]

唐代的玉冊可分為埋入墓中的哀冊和謚冊，以及祭祀天地的封禪冊。哀冊是以韻文的形式將頌揚帝王功德的內容刻在玉片上，謚冊則是將帝王對太子、王、妃、王公大臣冊封的內容刻在玉片上。哀冊和謚冊的使用範圍，在唐初僅限於皇帝、皇后、皇太后，高宗之後，太子墓中多用玉冊，如前述的懿德太子墓、節愍太子墓、惠昭太子墓都使用了玉冊，安史之亂以後，玉冊制度已被僭越，如史思明一類地方霸主也使用了玉冊。玉冊的共同特徵是扁平體長條形，兩端各橫穿一孔，以便穿綴成冊，一面刻文，有的還在冊文的筆道中內填金粉。皇帝玉冊放在石匣之中，太子的玉冊置於箱匣之中。然後埋入墓中。根據文獻記載，古代玉冊的長寬比例為十比一，上述考古發現的唐京畿之地的玉冊其長寬比例與此基本吻合。目前發現的唐代所有哀冊和謚冊，均是以石代玉，無一例外是用真玉，包括唐僖宗靖陵出土的一枚殘謚冊，也是用漢白石。^[54]

根據《隋書·禮儀志》（卷九）記載：“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策十二枚，六枚與軸

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由此說明隋代以前均用竹冊。《舊五代史·禮志下》（卷一四三）也說：“魏晉郊廟祝文，書於冊，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廟用玉冊。玄宗親祭郊廟，用玉為冊……。”正如前述，唐代始用玉冊，但仍是以石代玉，這主要是哀冊、謚冊內容較長，刻字比較困難，用石代玉，可解決這一難題。不但哀冊、謚冊是以石代玉，封禪冊亦是如此。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周代就已有封禪儀式，到了戰國時，魯國的儒生認為五岳之中，泰山最高，帝王應在泰山築壇而祭天，稱為封，在山南的梁父山上選地祭地曰“禪”。按《史記·封禪書》所載，封禪儀式是首日封天，次日禪地，要將祝告辭刻於冊，并封於匣中，放入石函中，埋入祭壇中。唐代皇帝仍然重視封禪大典，《開元禮》對唐玄宗在開元十三年的封禪儀式和用玉情況有詳細記述。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唐玄宗禪地祇時所埋的玉冊和玉璧曾經出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仍在當年唐玄宗禪禮地點，先埋唐冊，後埋宋真宗玉冊，1931年二冊均由馬鴻逵所率部隊在山東泰安蒿裏山上挖出。1971年，兩玉冊又捐贈給臺北故宮博物院，其禪地冊仍然是以石代玉。^[55]

5. 玉帶，盡管完整的玉帶在北朝時期已經出現，但唐代仍然是玉帶最為發達的時期，是唐代禮玉中發現數量最多，最具特徵的玉器，並且是唐代最為重視的玉器。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完整的唐代玉帶除河南三門峽姚懿墓上出一副由其子追贈的玉帶外^[56]，其餘均出土在唐代

京畿之地，前已敘述，唐代初年的寶礪墓中的玉帶，西安丈八溝唐代窖藏中的三副碾文白玉帶，西安西郊關廟小學的幾副玉帶上的帶銙，尤其是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的十副玉帶，這些玉帶的出土為研究唐代玉帶形制、特徵、治玉工藝乃至唐代輿服制度和中外文化交流都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以下重點探討寶礪墓和何家村窖藏所出土的玉帶。

寶礪墓的玉帶（圖版T1-11），結構（除韉朽外）完整，形制奇特，它以玉製作帶銙、鉞尾及蹀躞帶飾的邊框（或稱之表框），分別為長方形、圓形、一端尖葉忍冬花形，另一端方形，在玉邊框內嵌入金片，金片周邊折成筐形，金片上焊接以扁金絲編成的花卉、花葉的輪廓（形成筐），在其筐內鑲嵌各色“寶石”（？）、彩色玻璃和真珠，并在其餘空白處焊接密集的小金珠，然後將玉框與帶銙後所襯銅板鉚固在一起。此種在金筐內鑲寶嵌珠焊接小金珠的工藝，在陝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的物帳碑中稱為“金筐寶鈿真珠裝”。^[57]金筐技法目前所知最早的資料是公元前四世紀西徐亞人在金項圈中已經採用。^[58]唐詩中亦有“瑟瑟盛金匡”的詩句。^[59]寶礪玉帶中的玉框似乎就是《通典》（卷一〇八）中所稱的“玉梁”，其玉帶也就是《通典》所謂的“玉梁珠寶鈿帶”。另據筆者觀察寶礪墓玉帶金筐中所嵌的“寶石”并非天然寶石，而是人工玻璃製品。

唐代初年對使用玉帶有何規定？根據《新唐書·李靖傳》（卷九三）所言：“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勝，七